

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崭新的传承发展机遇

—— 从三个“迫切需要”看《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黄昌勇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近代以来，中国发展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交汇、融合的过程中曲折前行。如何看待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一直受到关注的重大命题，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莫不如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工作，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论述和观点成为《意见》的核心内容和思想。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变奏和丰富实践，《意见》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标识，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这些判断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意见》提出的三个“迫切需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觉醒，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有了文化的自觉方有文化的自信，当下某些人还有一股盲目崇洋的思想，因此丢失了文化自信。也因此，《意见》提出了第二个“迫切需要”即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不能不承认，提到传统文化，一些人会把它们等同于故纸堆和博物馆文化，把它们更多地看成是凝固的历史，对它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挖掘不够，传统文化的生机得不到培育、活力得不到张扬，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做得不够。第三，就是迫切需要加强政策支持，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可以认为这是《意见》中最为重要的带有顶层设计和可操作性的一项长期“工程”性的系统部署。这一传承发展体系有着鲜明的创新特点，构建了从深刻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工作，到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再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最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生产和生活整体性布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仍然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提炼总结，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只有这项工作做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有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在我们的整体性教育体系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虽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但总体上看，还存在某些不足，尚有可以提高的地方。《意见》中首次出现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的提法，

明确了国民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目前国民教育体系正在探索形成稳定、系统、有效的做法，比如我们正努力形成系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材和课程体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内容在教育体系暂付阙如，找准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也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思考。《意见》还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产和生活。提出加强国民的礼仪教育，加大对国家重要礼仪的普及教育，与宣传力度，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树立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年对规范性的礼仪在教育 and 传承上有所缺失。而礼仪是文化向文明转化的重要步骤，也是民族整体素养表现的重要方面。包括习俗、礼仪、礼节、礼貌、服饰、服装、言行、举止等都需要形成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系统性规范，成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意见》另一大亮点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

入生产生活各方面。提出要善于从传统资源中寻找题材、灵感和养分，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时代都创造出驻留历史的伟大作品。近代以来西方大量文艺样式进入中国，几代文艺家在吸收借鉴的同时也铸就了新的辉煌，比如新诗、现代小说、话剧、电影、歌剧、芭蕾、交响乐、油画等都留下了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的成功无不是融入了民族伟大的生活和传统的精神。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时代，我们期待更多波澜壮阔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的出现。

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是中华文明薪火不绝的重要基石，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俊·识

当代影像如何处理古代典籍谱系？

—— 从电影《西游伏妖篇》说起

杨俊蕾

拥有徐克和周星驰双重挂名保险、用公路片模式再现取经故事的《西游伏妖篇》（以下简称《伏妖篇》），从预期上来说，本是今年春节档影片中最值得期待的一部。

中国人对于古代文学“四大名著”的熟稔程度和实打实的情感喜爱，构成了多屏故事一再改编的雄厚观众基础。其中，《西游记》显然得到最多次数的各类改编。一方面要拜吴承恩原著故事的精彩跌宕所赐，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则是当前电影特效技术对于奇观画面的刻意追求，各种计算机辅助动画特效与品类繁盛的神仙/妖魔/鬼怪/乱力构成异样的匹配关系。而当这些从《西游记》改编而出的影像故事和人物形象，绵延进入现代人们的时空坐标，不仅在故事基底上构画着关于古代的印象，甚至构成了某种特殊时间段或者节庆到来前的影像标志，在近年以来的电影院大银幕上形成了年年有贺岁，贺岁主打靠“西游”的春节档电影特征。

观众对《伏妖篇》的期望之深，从该片在网上的预售票房刷新纪录可见一斑。同样，制作方与发行方为该片签下金额迄今最高的保底协议，也可见出对影片的盈利心愿之大。

但是，当徐克的邪典暗黑鬼魅风格撞上周星驰的全盘搞笑消解，很奇怪的，没有激发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成功化合反应，反而像一杯不能顺利融合的冲调饮品，固体归固体，比如取经四人一旦开口就是生硬搞笑的“大话风格”无厘头；液体归液体，比如各桥段的画面与特效，在烂漫铺张中极尽渲染与飘摇。影片中满满当当都是竭尽全力的复杂化充塞，观众却没有办法让自己融入感动，没有办法像喜爱“西游”原著那样欢喜这部《伏妖》。这也说明，首游”虽然是华语电影古装改编首选的超级热门大 IP，然而想要凭借“故事新编”获得票房与口碑双赢其实并不容易。

由于疏离了原著经典中的文化谱系，《伏妖篇》在物象画面上获得了没有辖约的癫狂自由

《伏妖篇》在核心呈现中表现出的问题，比如人物间情感逻辑乏力，人物行动和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失之模糊，情节零零落落片断化，不能如片中重金建模出的奇丽缤纷画面一样流畅紧凑等，其实是古代经典在现代改编中的普遍遭遇，其中的关键症结就是古代典籍内的自有谱系，在影像改编中经受了粉碎性的摧毁和虚拟再造。

对于《伏妖篇》的改编来说，西游原著中最根本的逻辑和常情民俗几乎被抽空，替换为周星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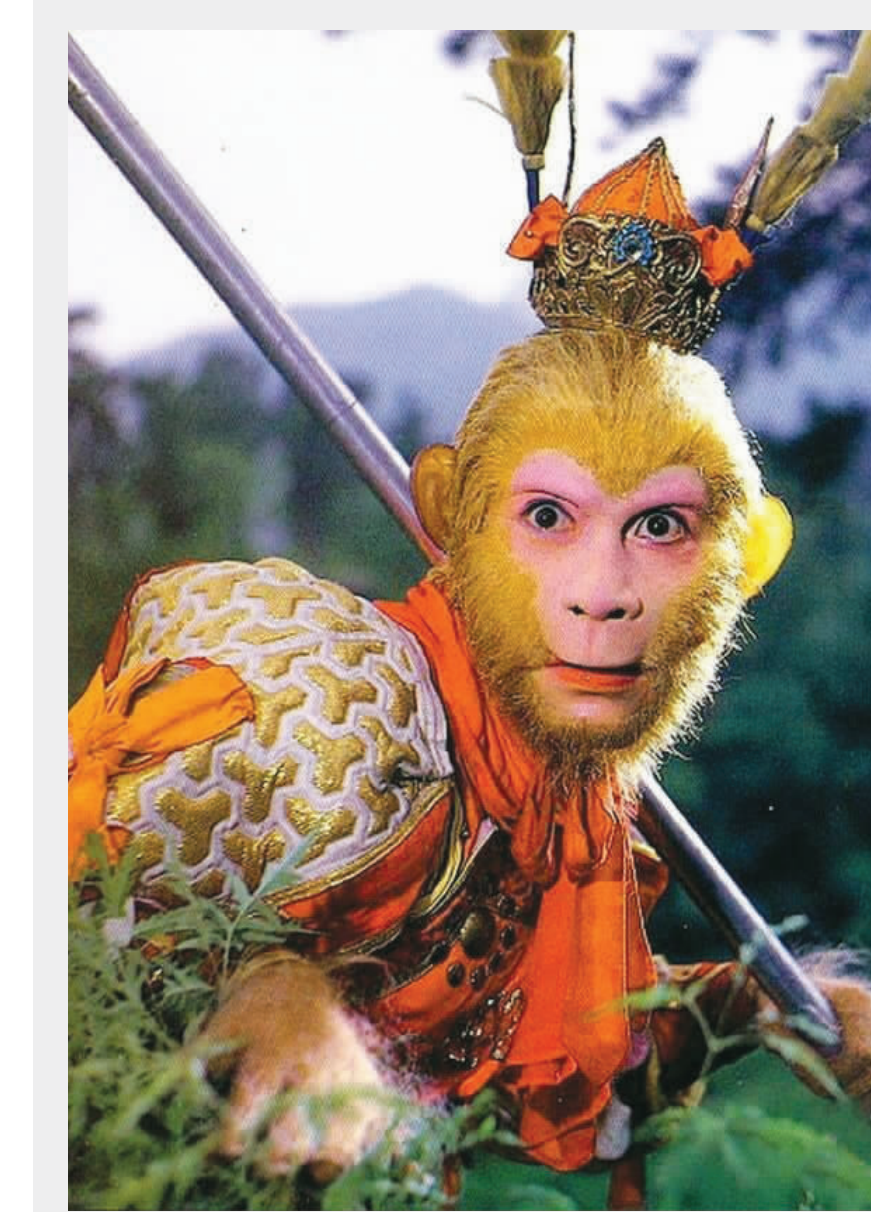
“大话西游”系列里建构的徒劳爱情故事。原著师徒关系中的正典塑造被完全颠覆，刻意夸大每个人物身上的脆弱创伤，同时减恩情、增仇恨，激化师徒四人之间的相互矛盾，让一路向西的协同共情关系改变为时时自危的互相提防。

由于疏离了原著经典中的文化谱系，《伏妖篇》在物象画面上获得了没有辖约的癫狂自由。徐、周二人的个性风格在此次影像合作中都不做保留地各显神通，也意味着彼此声气不通约、不和谐。开篇的杂耍画面，中场部分的比丘国景象，前者表现出徐克对于畸形怪异的造型习惯，后者的斑驳阉割更像是迪士尼城池与宫崎骏动漫的混搭。色彩确实斑斓，造型确实特异，然而与西游人物们的关系何在？那些飘在宫殿上的充气人偶，胡桃夹子般的形象乱入，一俟进入具体情节后统统消隐不见，除了一次引燃欢迎气氛之后，就再也无以为继，成为又一批脱离原有谱系后的断头线索。

之后，终场环节的金光普照与机械降神，不仅是强推的高潮与终结，更因袭了周星驰电影的习见结尾。这个结场画面内的水斗特效与孙悟空幻化为火炭人的计算机辅助动画形象，同样缺乏影像叙事的因果铺垫，再加上此前师徒人物和各色妖魔在基本动力逻辑上远离了原有的神话谱系，遍布打斗与搞笑的叙事部分里又没有足够的戏份说明如来佛祖即将施法降临的因果路径，因此在电影终结的时刻，又不得不借助人物语言来宣布九宫的真身妖相。另一个是暴力方面从头至尾的滥打滥杀，血洗河口村的残酷刺激在解释中有了充分合理的理由，反正是演戏给敌手看，幻相而已；同时在女性角色的情色展现上，蜘蛛精可以被八戒合理侮辱，白骨精可以在男性视野中起舞、沐浴，即便是比丘国宫内的干老丑娘们，也因此再度沦为调笑两性关系的老梗周氏话题。对此还不能批评他们演得过于造作，因为本来就是“演”而已。

周、徐二人联手打乱了西游原型故事的时空顺序和情感逻辑，却没有把一部古典章回小说真正转变为电影化的影像叙事

固然，对经典故事的翻新改编向来是电影制作的最大源泉与自由。然而，将原著典籍谱系进行碎片化处理后的升级手段，应该是成功转化的视听电影化语言，而在《伏妖篇》中，周、徐二人的联手改编只迈出了第一步，打乱西游原型故事的时空顺序和情感逻辑，将西游原著的神魔谱系碎



六小龄童版“孙悟空”（左图），吴亦凡版“唐僧”（右上），周星驰版“至尊宝”（右下）的形象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不同年代对西游记人物的理解。

如果《西游记》中的唐僧和孙悟空有“标准像”，那么央视 1986 年版电视剧中的造型，或许兼容性最强。随着“西游”题材在 30 年中成为华语电影古装改编首选，《大话西游》《西游》《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齐天大圣》等系列的出现，“孙悟空”“唐僧”的造型也一变再变。

片化，却迟迟没有完成视听转化，没有把一部古典章回小说转变为真正电影化的影像叙事，尤其是在关键性的“将计就计/佯狂演戏”情节转折上没有达到影像叙事的最基本要求——即“首先要让观众看见”。

唐僧揭秘孙悟空早已发现小善伪装这一关键转折，在片中其实是不可见的。虽然在造景环节上，影片给西游故事脑补了多次动态画面连续展现，然而一旦涉及必须融合电影化手段才能综合抵达的叙事高潮与关键，却又不得不依靠人物语言进行重复讲述，仍然返回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说书人语言手段，而不是现代电影的画面叙事。

影片始终回避了孙悟空火眼金睛的主观镜头，几乎没有画面去揭示孙悟空如何识破的妖怪，也就没有给予观众们

发现真相的契机，更没有贡献出一部经典改编中本该最具新创的诗意表达。相反，影片多次表现孙悟空使用常规妖怪鉴别办法的失败，并让观众对此产生主观视线上的融合：比如照妖镜，失效；假装无意间割破小善皮肤，滴血上镜面，失效；打杀一家老小也没有化现出原形，失效……所有这些画面都是古装玄幻电影中的常规手法，周星驰坚持了他一以贯之的嘲讽与解构，以此构建喜剧的笑点，最后以唐僧对九宫真人的反问来揭示真相并促成情节上的峰回路转。

然而问题是，这些常规手法深深地植根在各种古代典籍形成的文化谱系中，当电影改编割裂谱系、调侃陈规以获得创新性的表达时，想要完成关键情节转折仅靠一句事后自证聪明的台词显

然过于仓促，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后续的当代智慧加以续接，也就是针对唐僧的反问加以追问：是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当代电影工业化进程中，追求技术特效的脚步如何与中国故事创新讲述的能力共同进步

徐克和周星驰在《伏妖篇》末尾继续联手出演了彩蛋，扮成影院清洁工人催促观众散场：“不是大片，没有彩蛋。如果是大片，怎么会没彩蛋？因为不是大片，所以没有彩蛋……”

观众们期望炽烈却没有得以满足，慕盛名而来却不敢相信就这样草草完结，面对流连不肯离场的影迷们，两人的饶舌讥讽更像是连续的自嘲，他们在彩蛋中主诉的自我背反逻辑其实正是电影《伏妖篇》的写照，也是影片在断离了原著谱系后无法自救的悖谬：一面是极尽能事的视觉刺激，一面非常空缺实情与真理。

应该说，近年来，对经典丰富乃至芜杂的改编表现出一个耐人寻味也值得喜忧的现象：来自本民族的古典文化传承在当前影像创作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电影工业化进程中，追求技术特效的脚步如何与中国故事创新讲述的能力共同进步？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